

邓小平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廖 兴 森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提出并确立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在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斗争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贡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相统一,坚持尊重生产力、尊重人民、尊重实践相统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断完善和发展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思想理论成果,凝集在《邓小平文选》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文件之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统一起来,并论定为贯穿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即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最早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者统一起来的构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共产党人要抛弃本本主义、创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时,阐述了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点,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当时,这三个基本点还没有高度概括形成概念,统一也只是雏形。后来,他分别就这三个基本点进一步作过概括和论述,但也没有完全形成统一。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分六个方面重新概括,才完全将这三个基本点统一起来。决议写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实事求是”是根本点;“群众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这是邓小平主持下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阐发的重要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向我们指明,学习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就是掌握这三者相统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身体力行,他的著作给人最深的感受是:没有丝毫“本本”的气息,没有哪一篇不是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而又无一不贯穿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他特别注重把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反复强调,我们制定方针政策要紧

紧抓住合乎自己实际情况这一条，中国搞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中国搞建设也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他多次同来访的兄弟党领导人表达这样的思想：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正是基于这样深刻的认识，他突破多年来束缚各国共产党人的“共运中心”说，提出国际共运“无中心”的观点。他说：“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②。近年来，长期以“中心”自居的原苏联的解体，照搬苏联模式、作为“大家庭”成员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而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中国巍然屹立且充满蓬勃生机，都证明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正确。它将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二）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并将解放思想放在首位

毛泽东一贯倡导解放思想，他吸取“大跃进”中只讲解放思想不讲实事求是的教训，提出革命热情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观点。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决思想”^③。之所以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是因为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党内许多人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况和造成僵化的一些原因不是短时间能消除的，还清醒地估计到，现在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一项马克思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的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不解放思想就达不到实事求是，永远不能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④。邓小平断言：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确定符合中国情况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又是统一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⑤；“解放思想，就是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⑥。可见，离开实际，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决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也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至于有人以“实事求是”为名，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更是不允许的。对此，邓小平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一文中严肃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⑦；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后来，他针对国际上一些人的猜测，宣布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时，进一步把这一思想明确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⑧。总之，正如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文中所明确指出的：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重点是纠正“左”，出现右的倾向也要纠正。邓小平这一系列论述，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明了方向。

（三）从实际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在革命和建设道路问题上，必须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精辟论证：“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

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否则,必然“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所以最终没有成功,正是因为他违背了他自己论证的上述原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从建设“四化”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转变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并得出结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①1975年,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便提出全党都要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最早提出要迅速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指出,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实际,最重要的新情况新问题,代表着人民最大、最根本的利益,是解决中国社会诸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②。他正是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从实际出发,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开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荒谬地提出,“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邓小平说:“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③。从邓小平这段回顾,我们看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逻辑起点。这是邓小平抓住社会发展主要矛盾,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硕果。

(四)运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国际形势,把握时代特征

毛泽东当年对“实事求是”作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时,就要求“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④。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在作出国内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时,总是联系整个国际形势加以考虑,把握住时代的特征。其中,对我国以至世界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的创见,是把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看作是影响国际形势发展、造成世界各国密不可分的决定性因素。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⑤的论断。五年以后当东欧、苏联发生剧变,有人把国际形势看成一片漆黑的时候,他仍然认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⑥。他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⑦,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也是这个问题。他在谈到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从战争迫在眉睫转到维持世界和平有希望的重大转变时,首次阐述了新科技革命这个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⑧。与此相联系,邓小平得出结论:发达国家(北方)与发展中国家(南方)互相依存,不可分

离；中国的繁荣与稳定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需要中国。他说，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改变贫穷和落后，固然离不开世界，把自己“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①，“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②；反过来，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③。为什么呢？邓小平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他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④。根据上述判断，再结合国内形势，邓小平认为我们党的工作指导方针应该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是全党工作的大局，是贯穿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基本思想。围绕这个大局，他提出许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创造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新思想新举措，比如：中国永远不称霸，在第三世界不当头，一心一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国家关系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广交朋友；还有“一国两制”的构想，等等。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的扩大开放、和平统一大业的推进以及外交新格局的创建，证明邓小平上述论断的远见卓识。

（五）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坚持尊重生产力、尊重人民、尊重实践相统一

毛泽东对尊重生产力、尊重人民、尊重实践这三点，曾分别作过论述。邓小平进一步发展，并把它们统一起来。他在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纠正“左”的错误的根据时说：“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⑤。而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政策不能改变时，他又说：“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⑥；“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⑦。这些论述表明，尊重生产力、尊重人民、尊重实践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实践第一，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不对，要靠实践来检验；对不对的标准，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是否有利”（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结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标准；谁来作出检验和评价最有权威？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要看人民是不是得到利益，人民是不是高兴、是不是满意、是不是拥护、是不是赞成、是不是答应。在运作过程中，邓小平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敢闯、敢试、敢冒，又要走一步看一步，及时总结经验，看不准的，等一等，看一看，的确不妥当的，就赶快改。实践观点、生产力观点、群众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得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论断，能落到实处。

（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邓小平又提出，“思想路线的实现”，同政治路线一样，“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⑧，并就如何落实这种保证所应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作了科学论述。这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重要发展。其基本内容概括起来有二。一是必须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制度化、法律化。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⑨；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有充分

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⑧，“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⑨。二是选好接班人,解决好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保证有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并始终保持各级领导班子的生机和活力。这是邓小平总结我们党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

我们党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保持发扬民主、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从而保证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实现。但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没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下来,更没有形成制度和法律。一旦当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发生问题,损害以至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背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候,正确的意见就遭到压制、打击,以至一些本来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轻的错误,不仅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长时间得不到纠正。最突出的事例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我党的高层领导,曾先后就1956年的反冒进、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所谓“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1965—1966年“四清”的指导方针等四大问题,展开过争论。其中前三次,坚持实事求是提出正确或基本正确意见的同志,大都成了批判对象,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有的甚至被打倒;第四次关于“四清”指导方针之争的一方刘少奇,从此被认定为必须从政治上搞掉的对象^⑩。即使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也有位处高层的领导人提出正确的意见;甚至“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燃起,也还有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实事求是,进行“二日抗争”,批判极左,组织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的全面整顿。但他们都遭到同前四次被批判打倒一方同样的命运,有的甚至更悲惨,致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长时间蔓延。相反,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却得以形成,并进入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利用“文化大革命”为非作歹,祸国殃民。邓小平从这些惨痛的教训中得出结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⑪。

现行制度的弊端究竟在哪里?邓小平认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份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症结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⑫。而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之一,就在于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是从根本上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至于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⑬。而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实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出路何在?从组织制度方面上说,邓小平提出的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第一,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使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增强活力不僵化,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基层的积极性。为此,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的讲话,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第二,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联盟

领导人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问题比你们严重”^①。为此，他一再强调要按“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注重选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入领导机构。选择领导人，一定要废除“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的封建主义做法。同时要精简机构，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认为，这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②。第三，建立坚强、稳定、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既要树立和维护集体权威，发挥集体智慧，又要维护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③。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正常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④。因此，他把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并率先垂范，还希望在有生之年“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⑤，充分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纯洁党性和深谋远虑。

思想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思想，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意向，毛泽东曾经提出过，而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认识和历史的局限，还由于缺乏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实际上是权力越来越集中，“文革”时期发展到极端。邓小平吸取历史教训，提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理论和方针，使实事求是路线的实现能切实得到组织路线的保证，这在我们党和国际共运史上，还是第一次。

历史经验表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背离的倾向主要来自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迷信“本本”或者某种“模式”），这往往又与个人迷信相联；当然，也有右的干扰和破坏。反对这种“左”或右的错误倾向的锐利武器，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并寻求组织路线的保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邓小平同志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理论发展。

注 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131、323、243、323、242、149、175、134、134、136、293、281、291、352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249、116、223、105、353、354、127、117、78、79、106、115、173、83、240—241、310、311、273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⑲ 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4页。

（责任编辑 叶娟丽）